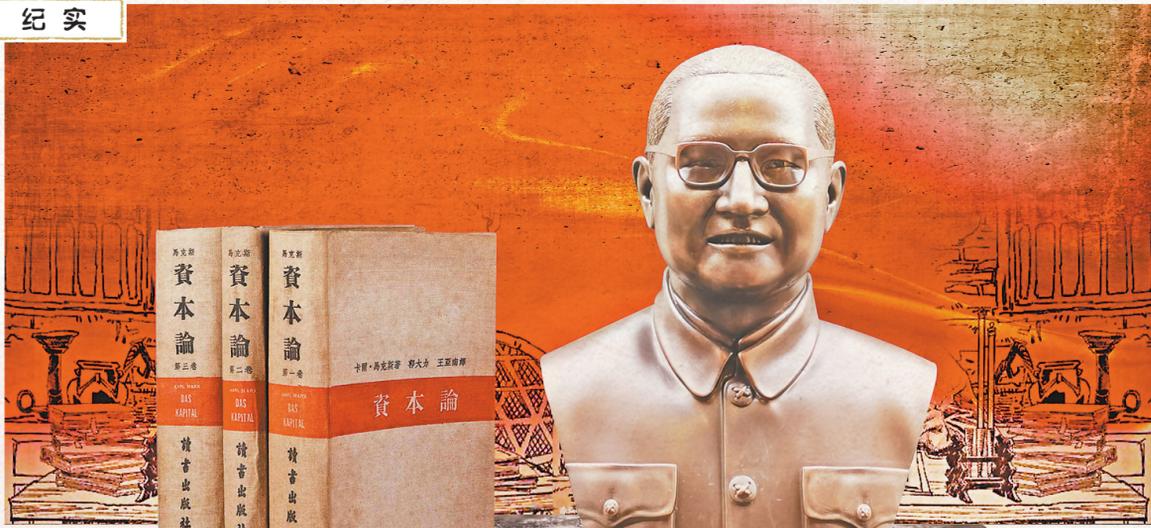


纪实



# 黑暗中，追寻那道光

□ 李冬明

“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四壁逼仄，在黑暗中摸索，前途难测，是什么支撑武陵渔夫穿过幽深的山洞，直至豁然开朗呢？答案是，因为有光。

动荡、离别、流亡、战火……五卅运动、世界经济大萧条、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一个个关乎民族危亡续存的大事件接踵而至。是什么让郭大力和王亚南矢志不渝、一以贯之翻译《资本论》呢？答案是，因为有光。

在风雨如晦的暗夜，他们一直追寻那道光。

——  
我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艾青《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英国伦敦，海格特公墓。一道阳光穿透林间薄雾，照在马克思雕像上。墓碑前摆放着鲜花，大理石基座上镌刻着“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阳光宛如闪电掠过密密匝匝的墓碑、尖塔，向这世界发出火花与电光。

中国江西，赣州郭大力故居。一缕阳光穿过客家民居的直棂窗，射入玻璃展柜。柜中静静陈列着80多年前出版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细纹米色布封面，中间套印3厘米红带，印着“资本论”3个醒目大字，庄重美观，落落大方；上方一行繁体小字“卡尔·马克思著 郭大力 王亚南译”。

郭大力、王亚南是谁？如何解码这时空的穿越？让我们追寻那道光，从一百多年前说起。

1918年11月，一位老人于60岁生日前在北京投积水潭自尽。临行前，老人问儿子：“这世界还会好吗？”

“这世界还会好吗？”这一声沉重的叩问，来自历史的深处。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从北京传至赣州。赣州学界、商界人士、开明绅士等爱国人士积极响应。正在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今赣州一中前身）就读的郭大力目睹和参与了这场爱国运动，他是赣州南康人。

他记得，赣州各中小学校师生们高呼口号，走向王府里广场，举行集会、发表演讲，通电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斗争。

他记得，赣州各界声援“闽案”：“呜呼，天祸中华，国是飘摇，日人既恃强占我青岛，因无公理可言，乃又戕杀我闽省商学军警诸同胞……辱国丧权，莫此为甚。”

1923年夏，18岁的郭大力考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始以科学救国为己任。校内，新旧两种理念、两股力量交织着。次年5月，一场酝酿已久的学潮爆发。郭大力等大部分学生毫不畏惧，追随进步教授签名离校，转入上海大夏大学，他弃读化学转攻哲学。

1867年问世的《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大夏大学教师郭沫若制定了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五年计划”，他说：“如果能译《资本论》而死，要算是一种光荣的死。”哲学教授李石岑提到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好友陈启修对翻译《资本论》情有独钟。陈启修是中国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人。

新思潮群起竞逐，名教师谆谆教导。郭大力原名为郭秀勋，他把“勋”字拆开，“郭秀勋”成为“郭大力”，憧憬一种“有力的哲学”。

“五四”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我受石岑师思想的感召，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读书期间，曾在书店购得一本英文版《资本论》，萌生了翻译《资本论》的念头。”郭大力回忆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女神哟！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  
——郭沫若《女神》

1928年初的西子湖畔，刚下了雪，寒风料峭，游人稀少。

西湖边，一名20岁出头的青年，身着学生装、留着平头，正翻阅着一本“大书”，书的封面印着英文字母：

CAPITAL: A CRITICAL ANALYSIS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性分析》)

底下有一行小字：by KARL MARX(卡尔·马克思著)。

“您好，这一本厚厚的外文书，您是在读？”对方浓浓的湖北口音，爽朗又急切，透着几分军人的硬朗干练。

“马克思的《资本论》，英文版的。”“学生装”合上书。

“马克思？德国的那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青年好奇地问。

“正是！”

“……”

“学生装”是郭大力，那位青年是王亚南，湖北黄冈人。大学毕业后，王亚南先在成城中学教书，失业后又投笔从戎，只身赴长沙担任北伐部队政治教员。然而，“马日事变”一场蓄谋已久的血雨腥风后，在白色恐怖下，王亚南怀着悲愤与失望，搭船东行到上海，随后漂泊至杭州。

两人在西湖畔偶遇，这年郭大力23岁，王亚南27岁。他们一见如故，志趣相投，畅所欲言。

得知王亚南准备写小说，郭大力问道：“你认为文学可以治疗社会痼疾？”接着说，文学确实可以陶冶人心，但人们关心的更多是“柴米油盐”。

“那你的意思呢？如何才能更好地改造社会？”王亚南问。

“我意改造社会，应从经济制度入手。”郭大力笃定地说。

杭州西湖北山路，一座凋敝的寺院内，落叶满地，赭色山崖上一尊残缺的石像，法相凝重，静默风中。两个青年寄宿在大佛寺内，决定以翻译《资本论》为志业，并拟定了一份计划：用六至八年时间，先翻译亚当·斯密等人写的四部经济学领域世界名著，最终完成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

赣州南康，深夜，突然一声巨响，潭口镇真君庙正门被撞开，一时间喊杀声、土枪土炮声此起彼伏；一番激战后，天明时分，庙内团丁溃逃而空……1928年，江西南康、赣县、信丰、于都、寻乌、兴国等地相继爆发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暴动；星星之火已在革命摇篮井冈山点燃……

“我译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已很理解它，也不是因为我已有了翻译的能力。1928年，国民党全面背叛了革命，红色政权已在江西建立。当时，我只觉得一点：有革命的需要。”郭大力回忆说。

立于高山之巅，东方朝日喷薄欲出。

——  
也许你已经很累，很累？  
但是听我说，亲爱的，  
当发光的信念以你确定的方位时，  
你要快乐些！  
——舒婷《礁石与灯塔》

太阳刚刚过了地平线，苏州河的浊水幻变成了金绿色。入夜后，十里洋场形形色色的元素交织成了独特的风景。

上海拉斐德路一家小咖啡馆里，从真如镇住处赶来的郭大力，与当日刚从东京抵达上海的王亚南会见了。

1934年初，福建事变失败后，王亚南被迫流亡欧洲。一年后，这位身居异国的流浪者搭乘横跨西伯利亚的火车，来到日本东京，距他上次因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而愤然离开已4年了。1935年底，他又悄悄潜回上海。

久别重逢，两人迫不及待倾诉各自经历。说话间，郭大力心事重重。王亚南觉察到挚友的欲言又止。

“我译好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大部分稿子，在1932年‘一·二八’炮火中丢失了。”郭大力沮丧地说。

几十万字的译稿，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王亚南顿时沉默了。“没关系，我们从头再来！”稍作停顿后，他鼓励说。

王亚南的爽朗与坚定，感染了郭大力。“好吧！我们从头再来！”

在那个风雨飘摇、危机四伏的年代，在这个雾气腾腾的小咖啡馆，他们又一次商定《资本论》的翻译计划。

咚、咚、咚……海关零点的钟声敲响，子夜已过，新的一天来临了。穿过浓浓的夜色，他们坚定地迈开脚步，向着亮光的方向前进。

1937年一个春天的早晨，上海劳神父路，王

亚南的住处迎来两位文质彬彬的客人。

“听说两位正在翻译《资本论》，今天登门拜访，特来请教两位是否有出版意愿？”寒暄后，客人开门见山地说。

郭大力、王亚南微微点头示意。

“当前，中国正值危亡之秋，欲改造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了解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必须从《资本论》入手。”客人说明来意：《资本论》第一卷中文译本出版后，至今第二、第三卷中译本仍未出版，读者迫切希望能在中国看到全译本问世。

郭大力、王亚南心潮澎湃：他们已屡次碰壁，大多出版社都不愿冒险出版《资本论》这样一部红色著作，如今，竟有出版社主动上门洽谈出版事宜！客人是艾思奇、郑易里，出版社是当时上海少数“戴红帽子”的读书生活出版社。

在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刻”，翻译家与出版人携起手来，一起干着这件“中国人早该做的事”。

四  
它发出的每一个音响是多么美妙动听  
它奏出的每一章乐曲都萦绕在我耳际  
——马克思《给燕妮》

“秀勋先生，电报，上海来的。”接过乡邮员手中电报一看，郭大力喜出望外，不禁喊一声：“好！”

电报是郑易里发来的，他说，《资本论》中文全译本很快就要出版了，请郭大力从赣南速往上海，共同完成出版事宜。

上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危在旦夕。郭大力将厚厚的一包《资本论》第一卷译稿交给郑易里，随后拖家带口返回暂避战火的赣南老家。乡间生活寂寞清苦，但郭大力很享受这份安宁。他把低矮的老屋改成了书斋，继续专心致志地翻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

厢房逼仄，屋内光线暗，没有电灯，看书译书都是难题。郭大力每天译稿看书超过12小时，翻译上万字，先译出初稿，再修改，再用薄薄的航空纸誊抄，隔一段时间用挂号信寄给郑易里。

《资本论》德文版第一卷1867年出版，马克思未曾料到：70年后，在中国江西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落，一串串德文单词正变成一个一个个方块汉字。

要去上海？！路上要经过战区，上海已成“孤岛”，全家人都担忧郭大力的安全。但为了《资本论》中文全译本早日出版，他毅然踏上艰险征途，两个星期后才抵沪。

《资本论》第一卷书稿完成后，马克思没钱邮寄。在恩格斯资助下，他买了一张站票，从伦敦乘海船前往汉堡。船上，马克思是为数不多的身穿礼服而笔直站着的乘客。

郑易里在上海斜桥弄留守处小屋里，为郭大力摆了一张行军床和一桌、一椅。他们夜以继日工作，困了就靠在桌子上闭一闭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进入盛夏，上海酷暑难当，大家挤在狭小的房间里，汗流浃背，就像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经过4个月高度紧张的工作，180余万字的《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三卷）终于在1938年8、9月间全部出版了。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

在民族危亡存亡之秋，在民众苦难深重之时，在抗战硝烟烽火之中，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终于把革命的火种，“盗”到了亚洲的东方古国。

当时《新华日报》刊登评论，称赞：“翻译世界第一部伟大的著作，是翻译界一个巨大的收获。”

后记  
《资本论》中文全译本（三卷）出版后，郭大力又开始翻译被称作“《资本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学说史》。1949年5月，上海甫一解放，崭新的三卷四册《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文全译本就摆上了书店书架。这是献给新中国的一份大礼。

今年是郭大力诞辰120周年。近期，红旗出版社出版《寻光——〈资本论〉首个中文全译本诞生记》一书，首次以报告文学形式全景式展现了这一传奇历程，讲述了郭大力、王亚南一生矢志不渝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到中国来的光辉事迹。赣州、杭州、上海、北京、厦门、武汉、黄冈……搜集资料、实地探究、面对面访问，笔者为何两年多时间坚持不懈追寻两位译者的足迹呢？

答案是，因为有光——“高尚人格”之光。

赣地采风

## 轻盈的鄱阳湖

□ 彭文斌

群雁在飞

冬日的鄱阳湖，是蓝精灵栖息的家园。远山和近水，都是丹青高手笔下的水墨，那么凝练、简约，却意境深远。

天青色，雨未来。几艘桅杆船缓行于大湖之上，像极了被画家的纤毫牵引着起伏于宣纸间。风吹着我的衣袂，吹去我的体重，我如同被仙气附体。想起太白的那句诗歌：“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眼前的鄱阳湖湿地公园，气质丝毫不输于传说中的仙岛。

朋友石立新一直在动情地讲述着鄱阳湖的春夏秋冬。这位在湖畔生活了半个世纪的诗人，写了大量关于鄱阳湖的诗歌，他是如此渴望向外地的客人们亮出家乡最美的一面。

“我们今天能看到候鸟吗？”有人忍不住发问。

石立新沉吟了片刻，说：“这个真的要运气，目前还不是看候鸟的最佳时间。”

其实，能够在鄱阳湖边走一走，领略湖光山色，已经是一种享受。此时，我的呼吸化为浪花，我就是一艘船，正与鄱阳湖融为一体。

忽然，石立新兴奋地说：“快看，大雁在集结！”

右侧的滩涂上，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抛撒食物，无数大雁从四面八方飞来，缓缓降落，列着队，有序前行。它们像幼儿园的孩子，快乐地拍打着翅膀，扭动着身躯，嘴里发出欢快的叫声。令我惊奇的是，前面的雁群进食完毕，便会主动让位于后一批，这些大雁，俨然是谦谦君子。

圩堤上一派静谧。我们居高临下看着这群弱小的生灵，仿佛守护着自己的孩子，平静中蕴藏着满满的爱意。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鸟群，我会有一种轻盈的感觉。”石立新说，“我觉得，每一种飞翔，都是有灵魂的。此刻，我短暂地拥有翅膀，聆听到风与天空摩擦的声音。”

多么富有诗意的解读。这是一个儿子对鄱阳湖的认知。

或许为了呼应石立新，忽然间，大雁纷纷起飞，仿佛漫天云朵洒洒。湖上，正飞翔着种种妙不可言的梦境。我的怀里，隐约有温暖的羽毛拍打而至。天、湖、人、鸟，组合成一个童话世界。

大雁在叫唤，声音清脆愉悦；大雁在舞蹈，造型优美简洁。蓝色的波涛如同热情的观众，发出阵阵欢呼。我们，这些所谓的都市人，瞬间间，好像服用了某种特效药物，心境变得辽阔，原本荒芜的心田间长出了茂盛的庄稼。

我体验到了石立新所说的“轻盈的感觉”。是的，雁群正携带着我和鄱阳湖一起飞翔。远方，像童话那般葱茏。

草是风的样子

无念岛是草的天堂。

湖水早已撤退，那些荻花坚持要让我们看到其妖娆的样子，蓼子草、苦草、龙舌草、水蕨也愿意共进退，它们缠绕在一起，构成了江南的草原。风驱动着草，仿佛驱动着无边的牛羊。星星点点的花像萤火虫，忽然迷糊了我的双眼。我是一棵行走的植物，也是一只流浪的羊。

鼻腔里充盈着泥土的芬芳，也有草的气息。鄱阳湖的草有着桀骜不驯的面孔，自由，无畏，筋骨铮铮。它们在水里生长，挣脱水的羁绊后，依然顽强坚韧，不改浩浩荡荡的气势。风像绵密不绝的鞭子，草毫不屈服，将风装进它们的身体里，然后以风的模样，倔强地留守在原地。

我能感觉到自己一次次被风拽向天空而后又被草们拽回土地，风与草正为了我展开一场厮杀。其实，我才是这个草洲上莽撞的闯入者。

几年前，我跟着一群诗人住在无念岛上的宾馆，热热闹闹地参加一个诗会。出乎我意料的是，这回重游故地，石立新告诉我：岛上的建筑全部拆除了，一切恢复了原生态。于是，如今的无念岛，唯有草和风拥抱着我。

我被芦苇摇晃，也被风摇晃。我变得如此轻盈，像滑过水草的渔船，向草的深处走去，去接受万物的宠爱。风云激荡的鄱阳湖抚平了一切创伤，只留下无边无际的草原任凭世人遐想，一棵草分明就是一枚词语，那么多的草，组合成大大地厚重的史书。

坐在草地上，我想起石立新的诗句：“蜿蜒的湖汉，低声部的芦苇丛，耸出削瘦肩胛的岛……”一切，与眼前的情景一模一样。于是，我也感受到了风的力度和风走过的痕迹。

不能不说，鄱阳湖是上苍赐予我们的明亮眸子。它让我们看到了白鹤、灰鹤、天鹅、黑鹳，看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看到了名利场之外的沉静部分。

曾经的渔船不见了，鄱阳湖从来没有如此宁静。我在草的亲吻中，聆听着一座大湖的心语。

漂在水上的内青

鄱阳籍作家范晓波说：内青村会浮水，却不曾游走。

内珠湖上，庙咀、腰里、大宗三个自然村组成内青村，漂浮在碧波之上，仿佛神秘的蓬莱仙境。任凭风吹雨打，小岛手挽着手，出没于青绿之间，抱团取暖，从不言弃。我要说，内青村是鄱阳湖留给人类的珍贵遗产。

汽车在这儿也变得轻盈起来，如同一只低飞的蝴蝶。在内青一落脚，我骤然间感受到了一种空灵。是的，好像置身空山，却又处处灵动，有百鸟在鸣唱。

四周都是水，不，是海，浩渺的鄱阳湖分明就是大海。潮水不知倦怠地向小岛不断发起冲锋，发出雄浑的龙吟之声。有人说这儿是江西版的“威尼斯”，我倒是觉得，内青犹如一艘劈风斩浪的大船，永不沉没。

内青本是渔村，三百多户人家，靠水吃水。曾几何时，船只披着晨曦远征，载着满舱鱼儿回村，日子在潮起潮落中周而复始，过得宠辱不惊。如今，沧桑变迁，渔舟唱晚的景象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十年禁渔，正深刻地改写着鄱阳湖区的历史。

我缓缓漫步于寸寸寸的内青村。狭小的地块上，密密簇簇坐落着一座座小楼，如果从高处俯瞰，它们像绚丽多彩的积木。湖水驱赶着取之不竭的青色染料，昼夜不息地熏染着小岛、渔村，连梦境都充满了葱茏之意。据说宋代范仲淹被贬饶州（今鄱阳）时，曾经夜泊内青一带，写下这样的诗句：“黄鹄渡口看黄鹄，忆想当年试水时。忽被南方风吹出，化为岩石镇湖眉。”

吃水很深的内青，在午后书写着真实的童话，湖泊只不过是背景和伴奏。它为远客营造着朦胧的浪漫，更为游子保留着缥缈的炊烟。内青，其实是湖上的盆景，那么玲珑剔透。美好的事物就是如此，尽管世界赠我一地鸡毛，我依然以一卷锦绣面向众生致意。

出圈与否，对于内青而言，似乎没有两样。它和鄱阳湖互为演员、互为观众，也相互依偎、相互成就。被湖水宠爱的内青村，是那样的空灵而轻盈，仿佛一丛花，终究要绽放。

我也越来越轻盈，化为一颗青色的水滴，随着诗歌的节奏，在鄱阳湖上频频跳跃。